

上海、台北与香港： 《新希望周刊》的三个阶段^{*}

刘 奎

内容提要 《新希望周刊》是易君左主办的综合性刊物，从 1948 年到 1954 年先后在上海、台北和香港出版，是 1949 年前后中国部分知识分子流亡轨迹和心路历程的见证。该刊有大量有关时局的政论和文艺作品：时局方面，关注重点经历了早期对国民当局战后“劫收”的批评、对和谈的期许，到港台时期关注冷战局势并最终被美国的文化冷战所裹挟；该刊的文艺作品如旧体诗词等，记录了时代变动中的社会和人心，也是易君左、左舜生、罗敦伟等文化人身处易代之际的心理见证，是研究 1949 年前后流亡知识分子的重要史料。

关键词 《新希望周刊》 易君左 冷战 易代之际 流亡

DOI:10.16228/j.issn1008-0163.2019.01.012

1948 年底易君左^①从兰州回到南京，旋即到上海，创办《新希望周刊》，居然一纸风行，“畅销二万余份”^②。不久易君左前往台湾，并在台北继续出版该刊，不过易君左在台湾也只停留了八个多月的时间，随即去了香港。据他自己所说，去香港的目的便是要出《新希望周刊》香港版，但直到 1954 年才终于达成这一愿望。《新希望周刊》随易君左流亡的轨迹，有上海、台湾和香港三个不同的版本。这份刊物的特殊之处在于，它见证了 1949 年前后中国知识分子“聚散离合”的过程，以及他们对时局的回应。本文试图以该刊的三个版本为对象，在描述该刊特色的基础上，将该刊置于 1949 年前后的历史语境，探讨该刊在流亡过程中的主要关注议题及其前后变化，并探讨该刊所反映的大时代中读书人的境遇变化等问题。

一、非常时期的“新希望”

1948 年，国共和谈已无法继续维持，文化人的和平政治理想无疑遭到挫败。易君左本来在兰

州主持《和平日报》，在时局的变动下也是匆促回到上海，面对当时东南文化界的氛围，他创办了《新希望周刊》，其用意大致是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唤起人们新的希望，正如他所说“圣经罗马书：‘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他。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，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？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……’”（八章、廿一至廿五节）圣经上这几句话，完全把我当时在上海办刊物的心理写出来了。我在当时一百个拟名中选用了《新希望》（New Hope）这个名字，通俗、大方、明朗、有力量。而且，那时正是徐州会战末期，兵荒马乱的时候，全国人心惶惶然，觉得没有一点希望了，我们想替民心、士气打气，给一点新的希望给大家，不要心灰，不要气馁，国家民族遭遇无穷的灾难，必有复兴的一天。就在民国三十八年二月十四日，新希望周刊在上海崭然出世。这刊物的封面旁边印有一行长字“建设和平、民主、自由、进步的新中国，实现安定、康乐、富强、大同的新希望。”这就是我们的新希望，也就是大家的新希

^{*}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六十年来台湾社会思潮的演进与人文学术的发展（1950—2010）”（项目编号：16ZD138）的阶段性成果。

望’”^③。易君左这个日后的回忆有更为鲜明的政治立场,但他依旧把握到了内战时期惶惶然的时代心理,在1949年的上海,民众之所以陷入困境,首要原因倒不是战争,而是国民政府内政的失败。

日本投降之后,国民政府接收失地,但接收实为劫收,贪污腐败,可谓乱象丛生。金融失序,物价飞涨,加上战争的威胁,人民确实处于绝望的边缘,当时《新希望周刊》编者对此也极为清楚,正如该刊发刊词所指出的,“站在一个中国人的立场,一个中国的老百姓的立场,我们应先痛切感受的是受着生存的威胁,简直叫我们大家不能再活下去。政治是这样的糟,差不多是‘凡官皆贪无吏不污’了,而豪门巨富逍遥海内外,坐视国家穷苦患难而一毛不拔,穷奢极欲度其荒淫的生活,有钱的纸醉金迷尽量享受,真正为国家担负重任的公教人员啼饥号寒,真正为国家主人的人民为征兵征粮及各种摊派弄得焦头烂额,战区的同胞流离死亡,一片愁苦凄惨!经济状况又是怎样?金圆券的发行丧失了政府的一切信用,害死了多少人,法币还勉强挣扎了几年而金圆券不到五个月便已宣布破产,以及金银兑现的翻来覆去百般欺诈,这叫做什么‘经济政策’?物价直线的飞腾上升,除开极少数有钱的人满不在乎外,大多数人民实在没有方法再活下去”^④。这些因素既是国民政府战争失利的原因,更是人民生活濒于绝境、精神陷入困境的原因。《新希望周刊》的“新希望”也是立足于人民的需要,“今天是什么世纪?是人民的世纪,而最大多数的人民在今天只有死亡一条道路可走,人类天然的生存权利被恶劣的经济政治剥削干净,毫无一点希望,一点前途和一线生机,叫人民怎样拥护政府?政府若不改弦更张,澈底革新,则不待军事的失败亦将全面崩溃,反之,政府如果把握这个最后时机,犹有可为。”^⑤“五四”时期与易君左一道参与新文化运动的陈顾远也撰文呼吁政府改革,“不能革故,何能鼎新;不能新生,何能求存”?变革的方略是“把握时代精神”“接近人民”:“在政治集团的生命方面,也不用说是要能时时适应人民的期望与需求,使人心所向,有如形影不离,自然就不会鱼烂草腐以

终。若再就集团的各个分子说,不仅要接近人民,还要与人民为伍,与大众同休戚,同甘苦,若离开人民的立场,自外于大众而有其优越感,在民主世纪的今日,必然影响到集团的命运。”^⑥

易君左等人的新希望是“我们反毁灭,反战乱,反破坏。我们求生存,求和平,求建设。我们要求国共两党以人民为重,彻底觉悟,精诚团结,立刻同时停战,拿政治的方式来解决国是,决定政权。”^⑦这是从反思国民政府积弊的基础上,所提出的新希望,这种革新的呼声在当时并不偶然,实际上差不多同时,蒋介石便已宣布下野,由代总统李宗仁接任。李宗仁上台后试图重新恢复和谈,《新希望周刊》对新的和谈虽然密切关注,但也意识到局势不容乐观,好几篇文章都指出和谈的困难,认为即便达成协议,也可能只是“间歇性的武装休战”,透露着文化人对当时政治的失望,也透露着文化人在政党政治面前的无力感^⑧。从这个角度而言,“新希望”之求和平实际上并无可能,至于生存和建设,在战乱年代更是无法得到保障。

二、文化与政治

因密切关注时局,《新希望周刊》登载了大量的时政文字,这跟易君左的人脉圈也有关系,他本来就是学法政出身,周边很多知交也是经济、政治等领域的专业人士,如罗敦伟是经济专家,在《新希望周刊》常撰文谈论经济问题。易君左、罗敦伟等都术业有专攻,在文化领域又能取得沟通。此处的文化主要是指传统文化,如传统诗词和绘画等;诗词、艺术是《新希望周刊》的重要组成,不仅仅是作为时政的点缀,也是文化人表达心迹、回应时代以及彼此交流的重要方式,文化内容与政治内容之间构成有效的互文与补充。

面对波谲云诡的政局,文化人虽多方奔走,但都无济于事,尤其是面对国共之间的斗争,文化人也面临左、右之间的抉择,这对他们的出处进退构成新的挑战,如自以为持中立态度的曹聚仁,因在香港《星岛日报》发表文章,也不免遭到批评,他在《新希望周刊》上登载的回应文章《今日知识分子自处之道》指出,“星岛走的是中央偏左的路,和大公报差不很远,尤可取者,他们的政治气息比

较单薄。我以为既非同人办的报纸,自难尽如人意,退而求其次,只要不牵入政争的圈子,也就可以让我们来自抒所见了”,最终也只能再度强调自己的立场“无论环境变化至如何程度,我依旧株守‘孤独’的圈子,决不投机!决不投入任何政治圈子去!”^⑨由此可见当时知识分子所处的语境。后来易君左等人赴台,在台湾这个由国民党当局统制的地界,自然一度免除了左右之争,但后来他到香港,却再度面临着比曹聚仁更为复杂的思想分界“由于世界新潮之激荡,人类思想之分野,壁垒森严,色彩鲜艳,非左即右,非白即红,已无中间路线。偏偏又有不左不右不红不白者,夹在这两大夹缝之中,事齐乎?事楚乎?舍鱼乎?舍熊掌乎?双方皆不愿事,两者皆不得兼,于是乎难矣。于是乎就有‘中间偏左’或‘中间偏右’,还有‘中间稍稍偏左’或‘中间稍稍偏右’。但,不管你‘稍稍’也好,不‘稍稍’也好,只要是向那一面偏,则另一面便会把你骂得狗血淋头,如果中立,则两方面都会攻击你体无完肤;如果一概不管,超然物外,又会被骂为冷血动物,或讥为落伍分子,至于此极”!^⑩这是易君左在香港时期所感受到的困境。1949年之后,较之上海、台湾较为单向的政治姿态,香港相对来说是一个更为多元、同时斗争也更为激烈的地方,易君左在这里感受到的政治和思想立场上的挑战,也是当时不少文化人遇到到类似的困境。

在一个剧烈转折的年代,各派思想之间的斗争也相对激烈,易君左等一开始并未选择依附某一特定阵营的文化人,自然会感到不适。不过,这群文化人的书写却从未离开政治,而是一开始就有着强烈的淑世情怀,易君左办这份综合性刊物的行为本身就表明了他的政治关怀,除议论时政外,他们的诗词也同样如此。

《新希望周刊》一开始就辟有“艺苑”专页,但前期主要是国画,后来才间或登载诗词,如第八期的《西湖专页》就登载了易君左的游记《山外青山楼外楼,西湖歌舞几时休?》和《谒岳王墓》《登六和塔》等五首词。虽然身处危难之际,但易君左游兴不减,除上海时期外,他在台北不足一年,但台湾的风景名胜大都有他的足迹,在香港十八年

更是遍游香港。这固然是个人爱好,不过也可看出易君左的名士气。在战乱频仍、政治混乱的年代,有时看山也不是山,从“西湖歌舞几时休”这个题名便可看出易君左对时代现状的讽咏,对执政者的不满溢于言表,文中他更是直接写到,面对岳王这样“万古千秋不爱钱的伟人”,“今日发国难财接收胜利财什么什么财者应愧死之后再愧死!”^⑪他的诗词更是直斥“应愧死巨奸大蠹,鸡鸣狗盗”^⑫;除直接呵斥发国难财的党国大佬以外,词中也表露了对时局的忧虑“华夏万年悲楚汉,春秋一部翻吴越。忽帘前铁马响丁当,西风烈!”^⑬

如果说上海时期还是风雨欲来的时代感受,到了台湾和香港,便让人切实地体验着战争所带来的离乱之境。尚在赴台的飞机上,易君左便拟想到台湾后的心境作诗一首“烽火红逐万鸦飞,茫茫云海渡台北,陆阻山陵水阻湖,漂泊离家归未得。名城呼吸迫存亡,繁华寂灭几沧桑?平生行脚皆沉重,唯兹一次稍轻狂。赤嵌楼外海波碧,我来重踏先人迹,煮豆燃箕事太哀,惊涛骇浪情何急!誓将豪气尽消除,顶礼焚香读父书,愿随日月潭中水,常伴花莲港里鱼。”^⑭存亡之际,有家不能归,只能渡海赴台,心中况味可想而知。不过台湾虽是异地,但毕竟与作者有渊源,其父易顺鼎在甲午之后,极力反对割台,积极为台湾奔走,曾多次前往台湾援助抗日,或许是因这层历史渊源,易君左在面对即将到达的台湾时,并无太多的焦虑与不安,故诗末转为冲淡。这是抵台前的拟想,赴台后诗人的心情是复杂的。虽常去草山、北投、碧潭、日月潭等名胜游历,但他诗词中却常有天涯漂泊之感,正如《泛舟碧潭》所写,“身是鸾飘兼凤泊,梦回虎踞与龙蟠,可怜玄武湖边客,万里投奔小碧潭”^⑮,同时对“游人逍遥荡桨去,不记烽火逼江南”的现象也有所批评,人们逃难到台湾,却“直把杭州当汴州”,在短暂的安逸中忘却了江南的烽火。易君左的这两首诗,在士林引起了较大的回响,很多诗人有唱和之作,表达的也是类似的家国之感,如罗敦伟和作中就有“匹夫无力问兴亡,诗情不复感沧桑”^⑯。时客居高雄的王奋也有和诗,诗中有句“百二河山尽血腥,漫说桃源不

可得。中原岂仅是诗亡？有人东望叹扶桑，欲挽天河洗瘴疠，忍看花酒事清狂。”^{①7}

为躲避战乱一路南下，易君左也体验到历史上无数流亡者的苦况，所谓“伶仃江上客，海上又伶仃”^{①8}，便是化用文天祥“零丁洋里叹零丁”句，表达其仓惶南下、羁旅天涯的心情；刚逃亡到台湾的罗继永也写诗表达其兴亡之感“衣冠祖国终思汉，雕犬仙源且避秦。水隔雪封成世外，渔舟未许问前津。谁为斯民解倒悬？神州无处不烽烟。红羊劫又余生历，青鸟书难一字传。”^{①9}时代转变之际，士大夫往往面临出处进退的选择，那些对新政有所怀疑的人，便只能选择追随旧政权行在或选择自我流放，前往台湾的文化人自然是追随国民党当局，前往香港从某种程度上可说是自我流放，或者说是选择观望。易君左在台湾生活不到一年，便前往香港，在《旅港杂咏》一诗中他写了“旅港生活艰难而心情抑郁”的情形“楚尾吴头客，天涯海角人。乾坤双袖泪，疆土百年尘。剑外难闻讯，桃源误问津。等闲成白首，犹是晋流民。”^{②0}相对上海或台北，香港这个现代都市显然让易君左更感孤寂。

《新希望周刊》上虽然刊载的都是旧体诗词，但却真实记录了转折时代文化人的心路历程，从他们的诗词中不仅可以窥见时局的变动，也可追溯文化人的流亡轨迹和心态，因而有诗史的意味，而《新希望周刊》很早也有这种自觉。易君左就曾介绍诗人薛大可的建议“老诗人薛大可告我，刊物所登诗词必备左列条件：（一）感伤时事者，（二）有惊奇性者，（三）有趣味性者，（四）具地方性者。除此而外，凡一切模古滥调试帖对句，均不宜登录，以免读者生厌。”^{②1}赴台后《新希望周刊》便辟有两个专栏，一是曾今可的“台湾诗史”，较为详尽地介绍台湾诗歌的源流；另一个便是易君左的“台湾诗情”，与“台湾诗史”主要介绍台湾历史上的著名诗人诗作不同，“台湾诗情”主要是介绍同时代诗人的经历和写作，这种同时代人的眼光，是《新希望周刊》诗歌具有诗史价值的重要原因。

该刊介绍的很多诗人，都是在戎马倥偬或流亡期间的创作，如朱铭新的作品，便是“在上海战

事最紧张的时候，从上海写信来”，在炮声隆隆中写作并随即寄往台湾发表，诗为“不辨雷声与炮声，惊回残梦一灯清。天心难挽东南劫，山雨欲来草木兵。万里投荒怀故友，一筹莫展困危城。英雄逐鹿民生苦，家国何年罢党争”^{②2}。炮声依稀可闻，而更重要的是诗人所表露的济世情怀以及个人在大时代中的无力感，因为在面对政党斗争时，文化人实际上显得微不足道；另外还有从沈阳一路逃难南下的诗人之作，“从他的信上看，是一位军人，而诗甚凄怨，反映时事，读之辛酸”，《新希望周刊》一共载其诗九首，仅举前两首略窥全豹：（1）“马骨填壕人骨横，野风吹过尚含腥。一身不怨流离苦，只恐山河面目更”；（2）“茅店鸡声月正明，匆匆推枕又长征。榆关道上人如水，半是流民半溃兵”^{②3}。诗歌写从东北到台湾的逃难经历，不仅写逃亡军人的所思所感，更有沿途的所见所闻，写出了从北到南的社会现状，是时代的真实见证，可谓诗史。

除了诗词外，《新希望周刊》还刊载有易君左的回忆录《三十年沧桑》，回忆他自留学日本早稻田以来的文学活动和革命经历；还有罗敦伟的《台湾杂缀》、左舜生的《万竹楼随笔》等，前者多写初到台湾的见闻，记录了光复初期台湾的社会现象，后者则是关于人物的掌故，有助了解民国历史人物；此外还有钱歌川、谢冰莹等人的散文和游记，对台湾的社会和名胜作深入介绍。从这个角度而言，与政论多关注宏观议题不同，《新希望周刊》的人文书写从微观的层面，记录了1949年前后的社会心理和文人生存状态。

三、从内战到冷战：地点转换与风格变迁

《新希望周刊》对时事的关注，以及他对同时代人生活和心理状况的及时反映，使它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。周刊在上海出11期，易君左赴台之后复刊，续接此前刊期继续出版；后在香港复刊时，刊期则另起炉灶。

《新希望周刊》之所以能在上海、台北等地相继出刊，除了易君左的个人努力外，也源于实业家的赞助。在上海时期得到橡胶厂老板徐中和的资助，徐中和与易君左和罗敦伟是旧识，“自动愿意

全力支持”并当发行人²⁴；在台北期间，易君左结识台北烟厂厂长任先志，“他与我是湖南同乡，兼有世谊”，与徐中和一样热情赞助并担任发行人²⁵。香港期间略有不同，因《新希望周刊》在上海和台北的畅销，易君左实际上已积累了部分资本，加上在港的稿费和字画收入，故能独资经营²⁶。因而，虽然刊物辗转三地，但易君左一直发挥着关键的作用，这使刊物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前后的连贯性，如易君左回忆录《沧桑三十年》就一直在周刊连载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易君左的人脉关系对《新希望周刊》有关键性影响，除了出资人大多是他的朋友外，周刊的作者群也多是他的圈内人，这也决定了周刊的基本面貌，如易君左擅诗词书画，且有家学渊源，故周刊的文艺部分主要是传统文艺；他的朋友中不少人学经济和法政，所以周刊对时政始终较为关注，且不乏深入的分析。虽然如此，周刊在不同地方还是要照顾当地的读者，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关注的问题也不同，因而前后还是呈现出较大的差异。

上海时期，《新希望周刊》持较为中立的立场，对国民党当局的施政措施多有批评，尤其对国民党的劫收、贪污及其后物价飞涨等政治和社会问题，作了尖锐的批评，认为出路在于立足人民的需要进行改革，实际上是部分地借鉴了左翼知识分子对人民议题的关注；其次是讨论和谈，1949年李宗仁任代总统之后，重启和谈，虽然《新希望周刊》同仁对此并不乐观，但依旧还是抱着和平的希望。在得知重启和谈之后，易君左自己也去访问了章士钊和江庸两位和谈代表，面对江庸的消极情绪，易君左还劝他“不管谈什么，怎样谈，总得先去谈，一谈就会有办法”，文末也表达他的期待“祝福我们和平使者，为人民，为国家，赶快地去，赶快地回，带着春天的好消息给我们吧！”²⁷对时局尚抱着和平的希望，对共产党的态度也并不太激烈，反而是批评国民党较多，希望国民党通过改革获得新生。上海时期周刊专门辟有文艺版，主要刊载书画、摄影、游记等，如溥心畲的画、郎静山的摄影、易君左的游记等，与时局的关系有些游离，带有明显的士大夫文化趣味。

台湾时期则不同。士大夫趣味逐渐让位于家

国危机，从薛大可的建议以及易君左所写的《台湾诗情》可以看出，诗人的目光转向更切近时代的问题。易君左也更为积极地向国民党建言献策，如在接受陈诚的问询之后，便写出《战斗的台湾文化建设论》，提倡“建立一个台湾的战斗文化体系”，“最重要的一点在以共同的心和力建筑一座精神的、心理的、思想的、无比坚强的堡垒”，“我们当前主要的工作，可以集结在以下三大类来开展：第一是针对当前国际环境和国内局势来剖解分析，指出其真实症结，判断其必然趋势，以坚定一般人的心理，加强其对国家民族前途的信念。第二是针对中共的谣言攻势匪谍攻势而予以驳斥纠正。第三是针对台湾的需要，一方面是配合台湾省防务与各项建设的需要予以文化上的协助，一方面是配合台湾人民生活（包括政治的、经济的、教育的、社会的）的需要而同他们密切的合作”²⁸。

相应地，《新希望周刊》的时政也转向讨论国际局势，这包括与台湾命运密切相关的两大问题：一是当时讨论较多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议题，一是冷战问题。对于前者，当时有论者撰文称，“和平业已绝望，世界正在向战争迈进途中”，认为“关于第三次大战是否必定发生的问题，由于近一年来时局演变的结果，似乎渐渐已经获得了肯定的答案”²⁹；对于冷战问题，常在周刊发文的宋文明便指出，随着美苏在欧洲势力划分完毕，必然转移到东方，“西方不再有熊，猎熊者要到东方。西方细雨霏霏，而东方正山雨欲来”，因而“亚洲必然展开冷战，正如欧洲必然冷战一样，是勿可避免的”³⁰。热战与冷战，虽然看似是两种完全相反的预测，但思维格局是一样的，都是在美、苏争霸的世界格局下思考中国问题，而周刊同人的立场是支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。

香港时期的周刊，处于冷战已成定局的时期，正如该刊所载穆骏的文章《热战暂停，冷战加剧》所显示的一样，当时冷战已成为主导性议题³¹。实际上香港版周刊能够顺利出版，便与美国主导的文化冷战政策密切相关。易君左赴港之后，便在自由出版社出版了好几本著作，自由出版社当时由青年党负责，青年党很多成员与易君左有旧，

如左舜生等与易君左早期都是“少年中国学会”成员。此时自由出版社是由美国在香港设立的美新新闻处资助的,对此易君左也心知肚明,他的回忆录就直言不讳“最初有一家‘自由出版社’拥有实力相当雄厚的‘美援’,规模相当大,主其事的是青年党的朋友,实际负责的是谢澄平先生”^②;此外,易君左后来也直接参与到“美援”文化体制中:当时美国在香港设立了多种基金以开展文化冷战,除了亚洲基金会外,还有一个“救助中国流亡知识分子协会”(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c.) ,易君左便在这个机构担任文艺组主任。据他介绍,“这个机构完全由美国方面主持,有两位美国重要人士总揽会务,一位的中国名字是费吴生,一位中国人欧伟国先生负实际推动会务的责任,下面有一部分工作人员”^③,“因为这个机构的经费来源是‘美援’,所以工作人员的待遇相当高,例如我们几个组主任的月薪是港币一千四百元,这个数字在当时港九一般公务员中是不小的,尤其在一般难胞眼中看来简直有些惊慕和嫉妒”^④,正因如此,易君左得以积累部分财资作为《新希望周刊》出版的费用。

不过尚需注意的是,虽然易君左本人在港期间深入地参与到了美国的文化冷战中,连《新希望周刊》的出版费都部分地来自他参加美国设立的“救助中国流亡知识分子协会”(ARCII)所获得的薪金,但就《新希望周刊》本身而言,这份刊物的香港版的政治性较之上海和台北时期反而更为淡化,与之前主要谈政治、文学仅作为点缀的整体编排不同,香港时期基本上是以文学为主,较少谈论政治问题。仅以复刊第一期而言,除左舜生《我对目前政治主张的摊牌》与曹聚仁《产生新希望之时代与环境》外,其他均为文学或掌故类作品,如王平陵的《拔牙记》、南宫搏《突厥皇后与中国音乐》、南山燕《明初文坛的两大领袖》、卫聚贤《谈谈过午》、郑学稼《记北洋两军阀》、鹿萍《林语堂与〈论语〉》、郑水心《诗钟全貌(一)》、易君左《访新娘潭》等,此后陆续还有钱穆、毛以亨、钱歌川、苏雪林等人的作品,可见其作家群以文史创作为主。

当然,不直接谈政治并不意味着是非政治性

的,它所刊载的部分文学作品也带有政治倾向,如吴万谷的旧体诗《遥寄黄陵》就写“一自山河改,黄魂与陆沉”^⑤,是冷战意识形态的更婉曲的表达,正如已有学者指出的是“隐蔽的权力”^⑥。

香港时期的《新希望周刊》延续了上海、台北时期的作者群,这包括两类人:一是早期在上海、台北曾为周刊写稿,而后也到香港的作家,这包括雷啸岑、马汉岳、左干忱、曹聚仁、李毓田、左舜生、黄陆平等^⑦;二是彼时身在台湾却在周刊发文的人文群体,正如易君左所介绍的“可以说:在自由区域的中国第一流作家学者差不多都为本刊集体执笔了,这是本刊最大的荣幸,也是读者最优的享受。从台湾寄来的专稿,除掉本期所登王平陵郑学稼两先生的大文外,尚有苏雪林、谢冰莹、钱歌川、罗敦伟、李辰冬、阮毅成、盛成诸先生的力作,都将逐期刊出”^⑧,这些作者大部分在台湾,也有的往返于台湾、东南亚和欧美之间。当时在该刊发文的香港文化人则有钱穆、毛以亨、易文、黄梦华、郑水心等,多较为知名。因而,港版《新希望周刊》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连接港台文坛的重要传媒,其作者的所跨地域的广度,也使它成为50年代初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流亡轨迹与心态的历史在场者和见证者。

四、结语

创刊于1949年上海的《新希望周刊》,随后辗转台北、香港,是转折时代文化人流亡的见证者。它所刊载的时政文字,是文化人面对时代变局,所作出的积极回应,从早期关注和谈,到后来关注冷战等国际局势,都是试图在大时代中找到国家和个人的出路。除了政论外,周刊还刊载了大量的书画、诗词、散文等文艺作品,其基本面貌经历了从早期的士大夫趣味,到后来关注社会问题的转变,记录流亡时局的诗词、散文等也具有诗史内涵,是了解大时代社会心理和个人心理的一手资料,为我们还原转折时代文化人的心路历程提供了可能,尤其显示了那些跟随国民党前往台湾的文化人心态的转变:上海时期对国民党当局的批评,赴台后转为支持和声援国民党,香港则提供了一个跳出内战视野的空间。从易君左个人而

言,他看似跳出了国共内战的框架,却又成为美国文化冷战政策的一环。易君左作为该刊主编,其人脉资源和个人文化趣味是影响该刊的主要因素;他早年参加“五四”运动,后又参加北伐,但同时又有传统诗书画的家学渊源,因而是一个兼容新旧的人物,这也决定了周刊的综合性面貌。

- ①易君左(1899-1972),原名易家铨,现代著名文人易顺鼎之子,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、日本早稻田大学。因家学渊源,他早年浸润传统诗文,曾参与传统文人的雅集,“五四”运动后,转向新文化运动,曾主办《奋斗》《家庭研究》,提倡新道德、新伦理,后与郭沫若、郁达夫等一道为泰东书局编书,曾写白话小说;参与发起“少年中国学会”,为《孤军》社一员,与左舜生、周佛海等关系密切;大革命期间投笔从戎,在北伐军政治部工作;后应周佛海之邀去江苏镇江教育厅工作,抗战期间前往四川,曾与卢冀野等办《民族诗坛》,抗战结束后一度赴兰州创办《和平日报》,1949年在上海办《新希望周刊》,不久赴台,继续出版《新希望周刊》,同年底转香港,任《星岛日报》副刊编辑,复刊《新希望周刊》,后任浸会学院文学教授,1968年再度赴台,直至1972年去世。
- ②易君左《复刊词》,《新希望周刊》(香港)创刊号第1期,1954年2月15日;易君左《烽火夕阳红》,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版,第165页。
- ③④⑤易君左《烽火夕阳红》,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版,第163-164、165、203页。
- ④⑤⑦编者《我们的新希望求生存和平建设》,《新希望周刊》第1期,1949年2月14日。
- ⑥陈顾远《新血液新生命——有了新生命才有新希望》,《新希望周刊》第2期,1949年2月21日。
- ⑧茅以思《和谈有没有希望》,《新希望周刊》第1期,1949年2月14日;何美羽《和谈究竟有没有希望》,《新希望周刊》第7期,1949年3月28日;端木进《和使北飞·看和平》,《新希望周刊》第9期,1949年4月11日。
- ⑨曹聚仁《今日知识分子自处之道》,《新希望周刊》第1期,1949年2月14日。

- ⑩易君左《乱世一切难》,载易君左《君左散文选》,(香港)大公书局1953年版,第167-168页。
- ⑪易君左《山外青山楼外楼,西湖歌舞几时休》,《新希望周刊》第8期,1949年4月4日。
- ⑫君左《谒岳王墓》,《新希望周刊》第8期。
- ⑬君左《登六和塔》,《新希望周刊》第8期。
- ⑭⑯易君左《台湾诗情》,《新希望周刊》第12期,1949年5月14日。
- ⑮君左《清幽的碧潭》,《新希望周刊》第15期,1949年6月4日。
- ⑰⑱⑲易君左《台湾诗情(四)》,《新希望周刊》第15期,1949年6月4日。
- ⑳㉑易君左《易君左四十年诗》,第330、388页。
- ㉒罗继永《旅台逢诗人节书感》,《新希望周刊》第15期。
- ㉓易君左《台湾诗情(五)》,《新希望周刊》第16期,1949年6月11日。
- ㉔㉕㉖易君左《天涯海角十八年》,香港大明王氏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,第46、70、59、61页。
- ㉗易君左《章士钊与江庸敲吧!和平之钟响了。》,《新希望周刊》第1期,1949年2月14日。
- ㉘易君左《战斗的台湾文化建设论》,《新希望周刊》第17期,1949年6月18日。
- ㉙翔实《透视第三次世界大战》,《新希望周刊》第58期,1950年4月5日。
- ㉚宋文明《冷战到亚洲》,《新希望周刊》第17期。
- ㉛穆骏《热战暂停,冷战加剧》,《新希望周刊》香港复刊号第26期,1954年8月9日。
- ㉜《海外诗坛》,《新希望周刊》香港复刊第49期,1955年1月17日。
- ㉝王梅香《隐蔽权力:美援文艺体制下的台港文学(1950-1962)》,台湾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,2015年。
- ㉞易君左《发刊词》,港创刊号第1期,1954年2月15日。
- ㉟易君左《编余小记》,港创刊号第1期,1954年2月15日。

作者简介:刘奎,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。